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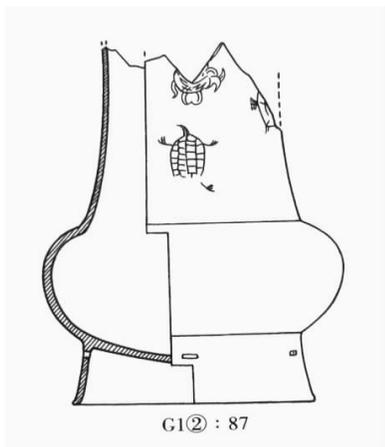
良渚文化四神新体系猜想



王仁湘

(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 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)

四方神,四灵,在古代中国信仰体系中是一个重要的次级体系,也是一个精致的符号体系。这个符号体系的形成,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,也许如有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,这个体系的初现往前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的史前时代。



图一 良渚文化黑陶壶(余杭卞家山)



图二

因为时间与地域之别,四神形成多种不同的版本体系,不过到了战国时代,已经大体一致,当然也小有分别。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,这个标准的四神版本直到两汉之际也还没有完全统一,可想在此之前7000~2000年间出现的中间版本一定也不少。

我这里有一个猜想,猜想良渚文化中已经有了四神信仰,而且它是一个稍显独特的四神体系版本,也是一个中间形态的版本。

良渚人有四神信仰并不奇怪,稍觉奇怪的是他们的四神符号体系。我们先来观察一件浙江余杭卞家山遗址出土的黑陶双鼻壶,器物编号G1②:87,壶的形制并无特别之处,但在筒口外部一侧刻画有几个动物图形。动物图形的分布显然有规律可循,应当是方菱形排列方式,动物图案处在菱形的四角位置(图一、图二、图三)。

在上角位置,刻画的是一只鸟,头尾分明,头顶有



图三 三图形位置

别
具
只
眼



图四 上角图形

羽冠(图四)。

在下角位置,刻画的是一只龟,龟背纹路清晰准确,存三足与尾巴,一足与头部残失(图五)。

在右角位置,因陶器残损,只留下一个半体动物之形,暂不能判明是何种属(图六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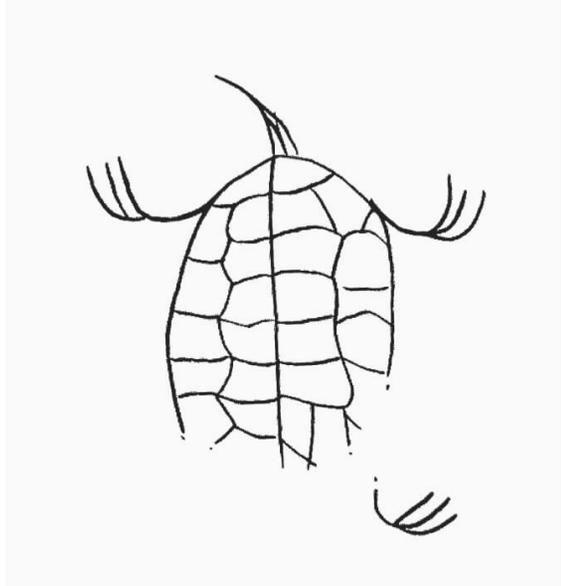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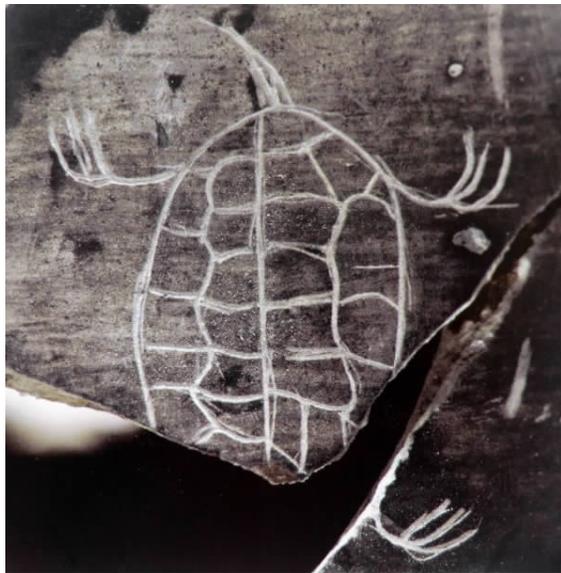
左角位置,由于陶器残缺,没有看到什么图形。

从发掘报告看对这件器物的描述比较简单,也没有更多的评论。只是确定地提到陶器刻画的动物中有一个是龟。

这是一组动物纹饰,纹饰为菱形角状四向布局,这个布局应当是可以确认的,推定它原本刻画有四个动物形体,一个动物占据一个角点。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图形是三缺一,左角图形因陶器缺损而不能明晰(图七)。

这一组动物纹饰,缺少了一个,又有一个不能判明种属,明确的只有鸟与龟。这鸟与龟的组合本来就很引人思索,而且它们的占位也很特别,鸟上龟下。这个占位与后来的四神完全相同,不能不让人往四神信仰上产生联想。上朱雀,下玄武,与后来四神是一样的占位布局。

这个联想就很自然地带来了一个猜想:想必良渚人的时代也拥有四神信仰,也创造出了四神符号体系?



图五

这是可能的。除了这一件陶器,良渚陶器上发现了其他一些动物形刻画,有猪、狗、鹿、鳄鱼之类,也有一些不能辨明种属的动物,它们中有的可能会被确定为四神中的符号(图八一图一二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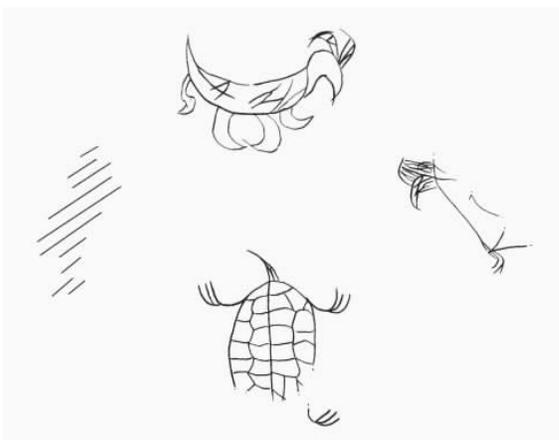
从下家山这件陶壶的刻画观察,良渚人的四神符号,除了鸟和龟,另两个符号还不能确定,但可以作一个初步的推断。

可以设想处在东方位置的,也许是鳄鱼。良渚陶器上见到明确的鳄鱼刻画,不少学者认为鳄鱼是龙的原型,所以它出现在这个方位并不奇怪。

而处在西方位置的则可以是猪,是野猪。野猪为山林动物,这个位置后来由虎接替,也是山林猛兽。先前在研究中我提到过猪崇拜到虎崇拜的转变,没有想到这个转变在四神体系中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印证。



图六 右角图形(残)



图七 四神全形布局示意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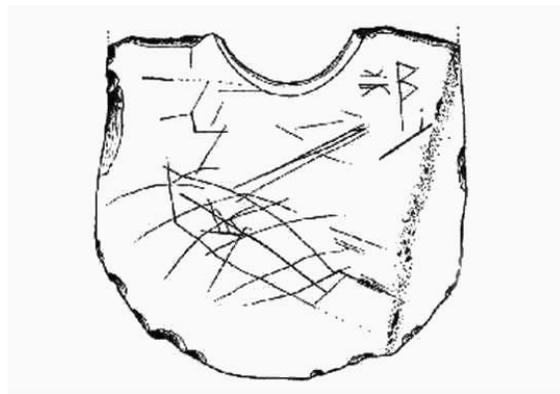


图八 余杭葡萄畝黑陶杯上的鳄鱼纹

这样一看,天上飞的鸟、地面爬的龟、水里游的鳄、山中行的猪,代表了不同空间界面的动物,这与后来的四神符号也比较吻合,除龟、鸟外,龙取代了鳄,虎取代了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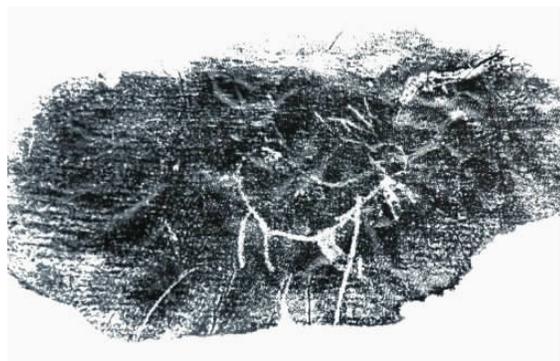
图九 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陶罐上的动物纹



图一〇 嘉兴庄桥坟良渚文化石钺上的动物纹



图一一 上海松江广富林陶尊上的动物纹



图一二 桐乡新地里陶罐上的动物纹

为着旁证上面的推想,我还要列举江苏澄湖发现的一件刻纹陶罐来作进一步说明。这件器物编号为



a.苏州澄湖陶器上的动物纹刻画



b.澄湖陶器四面图案展开图

图一三

74WCH 采 231,它的外表刻满了变形动物图纹,发掘者将器周刻画图形依次定名为猫、鸟、蝶、鸡、蛇。因为图形夸张变形很大,所以种属定名很不容易确认。

这其实也有可能是一个四灵组合,分别是虎(猪)、龟蛇(?)、鸟、虫(?)。真正能确认的,只是鸟的图形,而且变形也很大(图一三)。

可以猜想,今后的良渚考古中也许会有比较完整的画面发现,我们会见到鳄、猪、鸟、龟图形组合在一起。这是一个新的四灵版本,它似乎可以让人相信,是良渚人最先确定了上朱雀下玄武的选项。

我们耐心等待着新发现到来的那一天。

附记:图片主要选自良渚博物院编:《良渚文化刻画符号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5年。

(责任编辑:周广明)

上接 第 287 页

县北),仕齐为太学博士、尚书仆射。王绍曾、沙嘉孙著:《儒学与山左学术丛书》,《山东藏书家史略》增订本,第 14 页,齐鲁书社,2017 年。

⑤(明)张溥编、(清)吴汝纶选:《中华传世文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》,第 594 页,吉林人民出版社,1998 年。

⑥“胡貉匈奴之国,纵体施发,箕倨反言。”陈广忠:《淮南子斟论上》,第 543 页,黄山书社,2008 年。“被(披)发覆面,羌人因以为俗。”(南朝宋)范晔: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,第 2875 页,中华书局,1965 年。氏人“皆编发”,(西晋)陈寿:《三国志》(卷三十)《乌丸鲜卑东夷传》,第 8 页,山西古籍出版社,2004 年。“鲜卑者……今其人皆髡头,衣赭……”。转引自《东北古史资料丛编》(第一卷),第 389 页,辽沈书社,1989 年。河西鲜卑则“披发左衽”,(唐)房玄龄:《晋书》(卷一百二十六)《秃发利鹿孤载记》,第 2113 页,中华书局,2000 年。

⑦“石勒,字世龙,初名鞠,上党武乡羯人也。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。”《晋书》(卷一百四),《石勒载记上》,第 1809 页,中华书局,2000 年。“羌渠”是为“康居”异音,康居为粟特康居国。姚薇元:《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北朝胡姓考》(修订版),第 242~243 页,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3 年。

⑧Edward H. Shafer,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. A study of T'ang Exotics, Berkeley 1963, pp.4-5;吴玉贵译:《唐代的外来文明》,第 8 页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5 年。

⑨中共高台县委:《高台魏晋墓与河西历史文化研究》,第 491 页,甘肃教育出版社,2012 年。

⑩单海澜:《长安粟特艺术史》,第 57 页,三秦出版社,2015 年。

⑪“萨保”是官名,为梵语音译,原意为商队队长,而后在演变成管理波斯商人和主持祆教祭祀的祭司。北齐、隋、唐都设有此官职。尹申平、邢福来、李明等:《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2000 年第 6 期,第 33 页。

⑫由于部分人物形象尺寸较小,使得在图像中乐伎并未对高鼻、深目、蓄须有明确刻画,但参照葬具中其他男性形象,可知这三点是粟特人普遍的面相特征。

⑬单海澜:《长安粟特艺术史》,第 105 页,三秦出版社,2015 年。

⑭杨菁菁:《北朝至唐人华粟特人石质葬具艺术研究》,第 17~55 页,西北大学硕士论文,2018 年。分别为北齐益都付家台石墓、康业墓、安伽墓、史君墓、翟曹明墓、虞弘墓、石马坪墓以及现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的一组石棺床,共 8 组。

(责任编辑:刘慧中)